

烏托邦美學與後現代西方價值的失落

■ 梁燕城

本刊總編輯

最近浙江大學在杭州舉辦烏托邦美學的研討，紀念摩爾（Sir Thomas More）《烏托邦》（Utopia, 1516）一書發表五百年，是一與眾不同的會議。烏托邦原是想像遠在他方的理想世界，但地理大發現後，發覺並不存在這世界。到十九世紀，烏托邦思想代表一個未來的理想，以為未來應比現在好，然而發展到二十世紀，兩次大戰及之後的冷戰，展示一個絕不理想的現實。二十一世紀西方先進國通過全球化操控世界，與伊斯蘭的文明衝突形成中東生靈塗炭，難民流離。西方自身的民主自由理想，卻扭曲為後現代的自我中心主義，理想沒有實現，世界反而越來越差。

西方興起時原有高尚的價值觀，歷史上西方的興起，其文化的核心理念有三個根源，一是來自希臘的理性精神，研究事物的規律與思想邏輯；一是羅馬的「法治」體制，使社會有秩；而另一是來自猶太/基督教文化的靈性生命，重視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，自由與博愛，成為近代的「科學」、「契約」與「道德」精神。近代資本主義興起，商業具希臘文化的競爭性和擴張性的，但必須在羅馬文化的法律框架下擴張，不同商業團體之間須按基督教文化的契約，以確定利益關係，並在守約下競爭，而在這一切競爭中，商人須有道德良知，不欺騙顧客，不剝削窮人，且以財富回饋社會，濟助貧困弱勢大眾。

宗教改革強調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獨特自由的，到啟蒙運動之後，個人地位提高，於是西方文化加入了「個人」這因素，視國家與人民是一契約關係，須以法律保障人民的平等自由，每一公民是獨立自主的個體，有義務和責任去共同維護國家。這時的個人理念，仍是有普遍的理性和道德為其本性，故此社會倫理上，個人對社會整體有義務和責任。由此產生西方文化極盛期，而產生了自由、平等、民主與法治等較理想的體制。

然而西方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，社會倫理經歷一重大的變革。由於越戰引發歐美青年學生的強烈不滿，法國在一九六八年五月爆發學生革命，佔據校園、工廠和各機構，宣佈與傳統價值分離，建立新價值觀。美國反越戰運動用嬉皮士的吸大麻、性自由及搖滾音樂來抗議美國正統的道德價值。

這種反叛文化的風氣，配合後結構主義與後現代思想的興起，慢慢成為文化主流，轉出一種激進的自由主義，否定人文主義，否定有結構系統，否定有真實世界，也否定人有較崇高的普遍人性，認為人祇不過是一進化較高的動物，祇有每人獨特的個性和本能。

後現代文化在終極上採取價值的「虛無主義」及「道德相對主義」。在相對主義之下，引伸多元主義，社會沒有普遍價值標準，變成一種甚麼都可以 (anything goes) 思想。認為所謂人性，只是每個個人的「生存」，純從其動物本能去理解。因此假定人是無共同價值，其共同性僅在有動物的本能。

基於這無人性假設，人的唯一普遍性就剩下個人的自由及權利，於是將自由與人權凌駕於人性和道德價值以上，凌駕在家庭關係、人倫關係、責任義務及社會整體以上，所謂人權就被限制在這寡頭的自由內。否定了人的普遍人性後，個人本能的放縱就成為社會風氣，教育與文化主流排除一切價值。這時出現的，就是「自我中心主義」(egoism)。「自我中心主義」視人為禽獸的一種，沒有人性與人格。在這思想下，一切濫交、放縱、吸毒、賣淫、亂倫、畸戀都視為人自由和權利的表現。

後現代自我中心主義的美學，是純感性的視覺世界，只有色彩、音響、裝置、動作與微博或臉書中的矯飾作態，以表達自我的感覺為主。商品的牌號就成為自我的符號，故此牌號成為矯飾個人的美學符號，以象徵個人的品味或地位。

後現代已無崇高普遍的價值，研究後現代大眾文化的學者的約翰·多克(John Docker)很有見地的指出，後現代文化深有狂歡文化的模式。狂歡文化的背景是虛無主義，沒有真理或真實世界，人就只剩下無本性無內涵的自我，成為純縱欲的生物，且只能以自我為中心。狂歡文化的世界觀是一切隨起隨滅、短暫而虛無的世界。

後現代西方文化精神墮落為虛無主義，而且其霸政侵害全世界，已無資格領導世界文明。下一步人類往何處走？中國的經濟與國力在世界興起，但中國文化有什麼可提供給後現代全球文明呢？中國文化仍是初步重建中，如何提供一個新烏托邦的美學，為二十一世紀後半期建立理想呢？中國文化仍須創造的轉化，先吸納西方的自由、平等、民主與法治理想，再以易學的天、地、人全體平衡及和諧的思想，將之重構，而不落入自我中心及虛無中，在人心性找尋提升人生境界的修養，在超越的真理世界，肯定至高的理性與美善慈愛，或可重建文明的理想。